

农村卫生所革命化的榜样

——记青龙卫生所突出政治挂帅社会主义的方向

用什么态度干革命？

青龙地区在甘肃、宁夏交界的地方，包括五个大队、三千四百多个社员。这里有一个群众集资办起来的卫生所，因为先后请来的四个医生，有的生病回家，有的怕苦而去，办了一年。社员看病，得跑二十多里山路到公社卫生院，非常不便。一九六二年，根据当地领导的要求，县里派共产党员杨清和另一个中级卫生学校的毕业生一起，到这里来重建卫生所。

杨清清，曾经在人民解放军当过卫生员，复员后先后在县医院、公社卫生院工作过。当组织上决定让他去青龙地区工作时，他不迟退地背起了行李出发了。

他带着那个卫生学校的毕业生，翻山越岭来到了青龙卫生所。那里，迎接他们的是十分困难的工作条件。打开卫生所的门一看，两间旧房，屋顶漏雨，有窗无窗；一个破药柜，只放着七种简单的西药和一些不常用的中药；连睡觉的地方也没有。看到这种情况，那个毕业生心里凉了半截，后悔地说：“这个鬼地方！早知道这样，我根本就不来。”杨清清却笑了笑说：“干革命哪里没有困难？谁在山沟里建设起这么高大楼，再请你们！我们没来了，就要滚蛋了。”他立即动手收拾了房子，又到公社卫生院买来一些药品器械。他们吃饭，临时到社员家吃；睡觉，和社员挤在一个炕上。用了很久的卫生所，很快开始接待病人了。

工作刚刚有了一些头绪，他的那位同伴因为怕苦怕累，不到半个月就离开了卫生所。

卫生所条件就这么差，又没有个帮手，一个人怎么继续工作呢？杨清清反过来这么地想，一连几天没睡好觉。他想起了部队时的战斗生活，想起了部队首长教过的一课，一个革命者，要永远听党的话，吃大苦耐大劳，永不褪色，革命到底。他打主意，要《为人民服务》的文章，目光长久地停留在这段话上：“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毛主席的话照亮了他的心，鼓舞了他的斗志，他打定主意：“领导员们困难干下去！他自己的思想向公社党委作了汇报，得到了热情的鼓励：“你想得对！这里的群众很需要医生，一定要好好干下去。有困难咱们研究解决。”

从根本上来解决世界观问题

不久，党为了加强这个农村卫生所阵地，派遣当地贫农知识青年宋志明来当药工，又从县医院调来中医毕业的学徒王仲南来任医生。杨清清高兴地说：“这下算是人齐备了。可是，长在县城、工作在县医院的王自新，刚到这里，就被屈辱地喊叫：“三孔窑洞太清静，没有诊断室，大刚来住……。”杨清清看到这个状况，诚恳地对他讲：“这里很需要中医。到这里来，就要学习当年延安的艰苦奋斗作风。不能靠南雁寻食北方，气候寒冷还多。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一定要安心工作，扎根下，不怕困难，不怕累！”经过多次帮助，王自新开始安心工作了。

怎样才能使大家真正在山区扎根下，干一辈子呢？杨清清想：必须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树立革命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谁知刚提起这事，王自新就说了：“我上学里早就学过了。”杨清清耐心地回答：“那要学怎么学的？咱们学习一定要联系自己的思想才行。”从此，他们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他们先后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青年运动的方向》、《反对自由主义》、《矛盾论》等文章。他们有空就学，晚上躺在床上讨论。他们认真地检查思想，不断地提高觉悟。王自新在日记里写下了新的一页：“……白求恩这

一课使我明确了：一个人为了劳动人民而活着才是最有意义的。我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断改造自己。”他们还认真学习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自觉地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袭。一次，他们讨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篇文章，杨清清说：“咱们主要看南斯拉夫是怎么变的？是什么原因变的？咱们要怎样做才不会变！”宋志明问道：“咱这山沟里的小小卫生所能咋样变？”杨清清回答：“我看，是要让资产阶级思想抬抬，就会逐步朝坏的方向变！我们离领导远，生活又艰苦，要坚决站稳立场，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要想不变，就要完全完全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毛主席说什么都做么，党叫干啥就干啥！

毛泽东思想鼓舞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干劲。杨清清更加地严格要求自己了。他带头挑重担子，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大家。他和王自新，先后把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从城郊迁到青龙山区，扎根落户，决心为山区人民服务一辈子。在杨清清的带动下，三个人大踏步地朝着革命化的目标前进！

“学习老八路的硬骨头精神”

有了毛泽东思想作统帅，什么困难都不倒他们。为减轻国家、公社和群众负担，更好地为病人服务，他们提出了战斗的口号：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话，学习老八路的硬骨头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用我们的双手创造条件，改善条件。他们说：“穷，咱们就用穷人的办法！”一张三条腿桌子，支起了病榻；打针、算账的“万能桌”，药品没处放，就用土坯支起木板药架；没有处方纸，就用废纸代替；没有油灯，就用药瓶改装。他们宁愿多受一点苦，多受一点累，节约一分一厘的开支。公社接给三孔窑洞，他们自己动手担水、和泥、抹墙、盘炕、砌药柜，还利用废料制作了一些家具。蘸水笔是一个只三四分钱的，两年来他们只买了两个。宋志明成了卫生所的“红管家”，他一片纸、一块纱布、一个棉球、一个小药瓶，都非常珍惜。中药不足，他们就趁出诊的机会，到山上采集药材。卫生所购买的药品，都是他们自己从六、七里外的县城背回来的。一九六三年，宋志明第一次进城看病，住了一星期，花了一元二角钱，心里好多了。从此以后，他每次进城都自带干粮，住马店，一夜只花两角五分钱。有人问他：“住店，搭车，都能报销，你何必受这个罪？”他答道：“为人民服

务，就应该这样。”他们就是这样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给卫生所添置了一些必需的药品、器械，使卫生所的条件一天好起来。贫下中农满意地说：“毛主席把这几个年轻人引在好路上！卫生所象个样子了！”

两种医疗思想的斗争

这座山岭起伏，沟壑纵横，六十多户十户，回族社员，分别居住四五十户小庄。卫生所设在居中的大庄，距离周家山社才三四里，多则十四五里。

面对这样的工作环境，三位青年医务人员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困难，而是群众的要求。他们想：这里山沟就得爬山翻沟，群众到卫生所看一次病多不容易啊！他们提出了另一个战斗口号：山区卫生所野战医院化，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这个口号看来简单，要做到是不容易的。这是卫生所各条道路斗争的结果。在一九六二年卫生所刚刚恢复的时候，曾经提出“四不”：欠账不补，不先出诊收费不拿、天气不好和雨不问、危重病人不看。社员批评说：“这不看，不看，一是不看，二是不看。”现在，杨清清他们彻底改变了这个“四不看”的坏作风。他们热爱热情、吃苦、耐、负责、耐心、主动、简便、省钱的全心全意为山区人民服务的革命作风，建立了不少不登报、不分

山高路远，不分好坏天气，不分节日过年、不分县界线界的应诊制度。在这个卫生所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看病时间，病人随到随治，无所谓上下班，也无所谓节假日。三位医务人员常常是天一亮就吃早餐开始看病，午饭和晚饭只在看病空闲吃一点干粮，从不使病人久等。他们说：“宁可一人就大家，不使大家等一人。”

他们考虑到群众看病翻山越岭就不便，就用大部分时间进行巡回医疗、上门服务。几年来，他们踏遍了青龙山区的每条小径，每个山头。一九六四年年初的一个傍晚，他们正点灯动手做晚饭，忽然几处来请出诊，有两处的病人病情还很严重。这时，狂风在山谷里吼，雨夹着雪在空中飞舞。杨清清望了望天，王自新说：“是真心为人民服务，还是假意为人民服务，今晚就是个好考。咱们来个风雪大冒险！”两人立刻戴上草帽，挂上木棍，顶着风雪出发了。他们根据病人的病情，先翻山越岭到东庄，为七十多岁的李德义老汉治疗了恶性疟疾引起的中毒症。接着他们就动身前往太阳嘴。太阳嘴是这一带最高的山峰。李德义的孙子李贵周劝阻道：“那是猴子走的路，天又黑雪又大，怎能上去？还是住在我这儿吧。”他们说：“那里有病人等着，我们一定要去！”李贵周见他们执意要去，就扛上一把铁锹跟着他们。雨雪下个不停，路也不清，走到太阳山下时，王自新一看那峻峭的山峰，心里有点胆怯。杨清清鼓励道：“王自新！看看那峻峭的山峰！解放军在执行战斗任务时，刀山火海也挡不住。这点困难算啥？上！”说着，就带头向上爬。天黑路又滑，他们便手攀树杈，从陡坡爬，终于攀上了山顶。在两位社员朱玉珍治疗了经痛和周身关节痛之后，又立即回到山下的杨家沟，为李茂林的老伴看病。这时，已经夜深两点，他们敲开李茂林的门。老汉见他们浑身泥水已成冰块，感动地说：“快进，快进！旧社会用马也接不来么！”杨清清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我们还做得不够。以后，要骑马，骑马，直到第二天太阳升在这山里看完病，向另一个地方去，直到第二天太阳升在这山里，才结束风雪之夜的出诊。这一夜，他们没睡一口水，翻了五座山，过了六道沟，跑了四十多里路，到四山庄给七个社员看了病。

这种四处为群众看病，一切方便病人的革命精神，还表现在医疗工作的其它方面。为减轻群众看病的经济负担，他们常常为一个地方反复斟酌，开药的药，既能治好病，又比较省钱，并且尽量用平价、拔火罐等民间方法治疗。一九六四年，他们就给下中农交医疗费三百五十多次。有的病人药未看完病已痊愈，就可以把余药退还还价。不论是对病人，还是对病人的家属，他们都热情接待。要喝水，有开水；要煎药，有火盆、药锅。因一次突发重病回不去的，他们就让病人睡在自己的炕上。冬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社员武俊夫妇带孩子来卫生所看病，没有带药的，也没有住处。王自新给他们做飯，给小孩洗澡，让他们睡在自己的炕上。对于病人提出的意见，他们总是虚心听取并采纳。有的病人心情烦躁，态度不好，他们也不计较，还耐心地安慰、劝导。对一些年纪大的病人，他们开了药，都要三番五次地嘱咐怎么用服。

为人民敢于挑重担

青龙卫生所，先后治愈了四十多例危重病症，在六盘山区传为佳话。杨清清说：论技术我们很粗，论条件我们很差，论药我们缺少，但贫下中农有了病，我们就有责任治疗。只要有高度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就能使技术和药物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九六四年夏收季节的一天，官庄大队来家湾生产队的社员张生家和杨占梅，被火烧伤，伤势非常严重。对这样的烧伤，杨清清和王自新不但没有有过，连见也没有见过。按照这

的品质深深感动了，决心就地承担一切办法救活这两个阶级兄弟。公社党委也支持他们在当地抢救。

怎么抢救？他们拿出《农村医生手册》，但是书上讲的棉花、输血、注射破伤风抗毒素等措施，在这里一样也不到。杨清清说：“我们要尊重科学技术，但不能单纯迷信书本，死搬硬套。要是死搬硬套，只会感到没有办法。”他们最后决定：“西药不足，中药参战，洋的没有，土法上马。”

首先碰到的难关是怎样防止感染。时值夏天，病人住在土窑洞，卫生条件很差。他们经过分析认为，感染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绝对不能避免的。没有无菌病房和药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消极等待和粗心大意。针对这个情况，他们提出：“严防土窑洞”，用药物喷洒了窑洞、灶、炕、被褥，把衣物、用具进行了消毒。每次换药之前，都用消毒水把室内喷洒一遍，并把被褥放在日光下曝晒。终于度过了这个难关。

伤势较重的张生家，第三天和第六天，连续两次处于昏迷状态，人事不省。防止休克，是两位医生面临的又一难关。当时，卫生所所有的二十二支葡萄糖和两千毫克抗坏血酸，已经全部用完了。大雨倾盆下着，到外地求援有困难。他们决定从中药上想办法。王自新经过反复考虑，给病人开了一服大剂量中药。病人服用后，果然生效，起了消炎、镇痛、抗休克的作用。接着，他们根据农村的经验，给病人饮用鸡汤、糖水、茶水、酸浆水和白浆汤，补充大量水分。

在抢救过程中，最难办的是换药。每换一次药，给病人带来不少痛苦，但他们感到十分不安。他们不嫌麻烦和劳累，采取轮流换药的办法，今天换一次，明天换两次，换一阵，停一阵，减轻病人的痛苦。每换一次药，长达五六小时，有时腰疼得直不起来。杨清清一次劳累过后，在换药中昏过去过。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情绪和旺盛的斗志，从来没有说过苦，没有叫过一声苦。结果，分别经过二十天和三十天时间，终于治愈了两个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四十六点七和百分之二十三的病人。

青龙卫生所抢救大批工伤烧伤病人消息的迅速传播，迅速传遍了六盘山区，平凉、会、县和社的许多医务人员，纷纷到该所前来访问。他们一致认为这是农村卫生战线上的一个创举。青龙卫生所三位医务人员也作了总结，他们说：“方向是毛主席给的，干劲是党交给的，腰是群众撑的，方法是大家想的。

为革命练过硬技术

怎么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更好地为山区人民服务，是青龙卫生所三位青年医务人员经常考虑的问题。学西医的杨清清看到当地群众多爱看中医，就下定决心学中医。他自修中医书，搜集民间方药，还到一百五十里外去听两位中医讲课。他反复读药性、汤头、病理、诊断等科目，将汤头歌贴在墙上。他边学习，边用边学。现在，他掌握了三十多个常用中药方剂和六十多个针灸穴。学中医的王自新到山区看病较多，每天起早贪晚在妇科方面钻研，现在已经经过“妇科法要谈”，并且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只有高小程度的宋志明，原来根本不认识药名、药材，更不知道药性、药性。他看到工作迫切要求他尽快地掌握这些知识，就下决心在中学、干中学、西药，请教杨清清；中药，问王自新。这样，经过两年的苦练，他不但认识了各种中草药物，能够熟练地抓药、取药；而且学会了二十多种中药炮制方法，还掌握了打粉、涂药等护理技术。

他们认识到要从根本上减少疾病对群众的危害，就要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把疾病消灭在发生之前。因此，两年来，他们经常向群众宣传卫生和劳动保护知识，宣传预防疾病的办法，并且挨门逐户去注射防疫针。去年，他们又为各个生产队大培训了一批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和接生员，使群众看病更加便利了。

本报记者 牛正武

据新华社南京电 每月八日，江苏各县各个生产队举行“民主活动日”的活动。社员们在这个月一次“民主活动日”里，听队长报告生产、听会计报告财务，然后对干部提意见，对生产和财务工作提建议，其中有表扬，有批评，有询问，有建议，很是有话。

太仓县的“民主活动日”制度是从去年七月间由县领导机关推广开来的。实践的结果证明，这个制度是扎根基层组织实行“四大民主”的一个简单可行的形式。干部群众纷纷反映：这个“民主活动日”是“月月清”、“通气会”、“团结日”、“鼓干劲日”。

在开始推行“民主活动日”的时候，有些干部顾虑少数群众只要提主要，不要集中，听批评，心里怕得辣辣的；在群众中，也怕得罪人的思想。因此，领导上组织干部们学习《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干部们懂得了发扬民主，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是尊重不尊重群众、相信不相信群众、依靠不依靠群众的问题；许多社员也打消了顾虑，提高了当家作主的觉悟。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这一制度就逐步建立和坚持下来了。

为了保证“民主活动日”取得效果，会前一般要做好三个准备：一是生产队开管理委员会，总结一个月份的生产、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研究本月份工作任务，订出小段计划，汇集生产队的好人好事，作好向社员大会报告和布置工作的准备。二是会计结好账目，填好公布表，在月初与贫协组长集中到大队，进行财务公布，大队会计进行业务辅导，作好口头公布和张榜公布的准备。三是贫协小组开会，讨论队里的生产、工作和对干部的意见，同时进行自我教育和讨论政治工作。

“民主活动日”的制度实行以后，进一步树立了社员当家作主的思想，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生产积极性。有些社员，生产队干得不好，办得不周到，在“民主活动日”上，往往有社员及时提出批评和建议，促进了生产和各项工作的改进。新毛公社有四个大队的部分生产队，去年秋丰收后准备建造粮棚和其他建筑，干部在“民主活动日”提出来后，贫下中农建议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后来，社员自己动手，节约地使用原材料，为集体节省资金二千七百多元。社员反映：生产队大会议，意见大家

提，问题大家找，办法大家想，先请大家学，搞好集体有保证。干部们通过“民主活动日”，进一步学会了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感到工作更好做了。

在“民主活动日”上，社员对干部的优缺点提表扬，对缺点提出批评；干部在群众的监督下，不断改进思想作风。浏河公社浏河大队八队队长马金熊，布置社员在棉田里夹种黄豆，有些社员对这一安排的措施不通，他就起劲态度。他在“民主活动日”上对他提出批评，同时也表扬了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进行的马金熊队长对他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有批评、有表扬，深受感动，表示决心改正缺点，以后对群众的态度就比较好了。现在不少干部从亲身感受体会到，推行“民主活动日”制度，是党和群众对自己政治上的关怀和帮助。一月提一次意见，小缺点不会变成大错误。”干部和社员经常在“民主活动日”进行思想见面，干群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民主活动日”又是对群众进行生动活泼的自我教育的形式。浏河公社有的生产队从去年十月八日的“民主活动日”上表扬了好人好事，当天下午就有主动做好事，不让家里吃集体的粮食；主动给队里提，或帮队里上街买饲料。

有的社员在“民主活动日”上检查自己的缺点。浏河公社江民大队八队的干部和社员遵守纪律使用大引机租机的规定，绝不吃租，先交租机粮米用，引起划租的队有意见。经过过党的教育，九队队长在“民主活动日”上作了检讨，社员也检查了光想自己先租粮可以分先租，不顾兄弟队，表示今后一定不这样做。

太仓县最近正在总结“民主活动日”这一工作，有如下的初步体会：第一，“民主活动日”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措施。因此，要把它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经常抓不懈。第二，要向干部、群众进行民主集中制教育，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不断提高觉悟与认识。第三，公社党委和大队党委都要加强对“民主活动日”的具体领导，使每次活动都收到效果。第四，“民主活动日”的内容要注意从实际出发，解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要紧密围绕生产，促进生产，把“民主活动日”的成果落实到生产上，防止形式主义。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女团体赛争夺激烈

第一阶段循环赛结束，男女各十四个小组名次全部产生

第二阶段循环赛开始，队实力接近，打得更为精彩

据新华社上海六日电 一九六六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女团体赛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赛，今天取得男女各十四个小组名次全部产生。获得男子各小组第一名的是：上海一队、北京一队、湖北队、江西队、河北一队、吉林队、江西二队、四川一队、广东一队、江苏一队。

获得女子各小组第一名的是：上海一队、四川队、广东一队、山东一队、北京二队、北京一队、上海二队、湖北二队、辽宁一队、山西队。

这二十个队经过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比赛决定男、女团体前三名名次。

经过第二阶段比赛的男、女团体都抓得很紧进行了总结，进一步做到了“知己知彼”，因此今天的比赛显得更加激烈。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男子团体第六名吉林队同第十七名安徽队今晚九点零五分进行打十二点零分的比赛，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吉林队以五比三获胜。

在各地乒乓球球队的将力的“挑战”下，许多强队在比赛中都经历了一番风险，有的甚至失利。由石硐、彭嘉豪、王碧玲组成的北京女子二队，战胜了第二届全运会女子团体第一名吉林队以后，取得了小组第一名，进入全国前十名的行列。

由第一阶段男子十四个小组的第一名各队参加的第二个小组，都出现了激战场面。其中二组，都出现了激战场面。去年全国冠军上海一队以五比三战胜了第二届全运会女子团体第一名江苏队，也取得小组第一名。

去年第二届全运会女子团体亚军四川队同第十九名福建女子一队的一场比赛，打了两个小时才分出胜负。福建女子一队先输两盘后，连扳两盘打成二比二。在关键的第五盘中，福建一十六岁的老将李雁平打了激烈的对攻战，最后却输掉以一比三的近比分失利。

第二届全运会男子团体第十八名河南队今天在第五组河南一队的比赛中，也表现出顽强的战斗风格。河南队的最强选手曾以二比一击败了河北一队名将王志良。

据新华社上海七日电 一九六六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女团体赛第二阶段分组循环赛今天开始，由于在男女、各七个组内的各队实力已接近，因此比赛显得更加激烈、精彩。

今天进行的二十一场男子团体赛，有十九场打入了决赛才分出胜负；二十四场女子团体赛，有十三场打入了决赛才分出胜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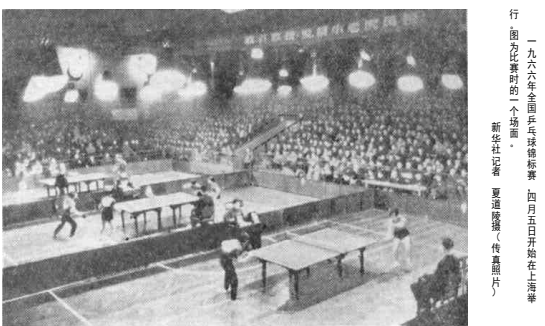
果是：去年全国亚军北京一队以五比二胜上海二队，第三名湖北一队以五比三胜上海二队，第六名吉林队以二比一击败第五名江苏一队。上海一队的余长春今年曾以零比二输给四川队的马金豹。北京一队则曾输给以二比二和一一二分别输给上海二队、天津队和湖北队。

在女子团体赛第二组中，引人注意的有去年全国第一名、由仇宝珍、于秀萍组成的山西队，以三比零击败了第六名、由李莉、刘翠琴、彭秀琳组成的北京一队。这两名山西选手都是横握球拍，一个是能削能攻，一个是全攻型，在比赛中以五比二胜上海二队，湖北队以三比二胜湖北队，湖北队以三比二胜湖北队，湖北队以三比二胜湖北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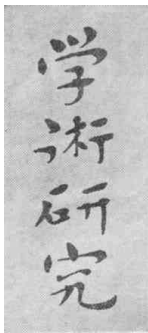
争夺激烈，女第十名以后的各队，在比赛中的表现，就显得乏力，力争上游，出现了好几场难解难分的场面。

男女团体赛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赛名次公报

- | | |
|-------------------------|---------------------------|
| 第一组——贵州队。 | 第八组——湖北队、广东一队。 |
| 第二组——广东一队、广西队、湖北三队。 | 第九组——辽宁一队、云南队、福建二队、浙江二队。 |
| 第三组——江苏一队、福建一队、上海四队。 | 第十组——山西队、河北一队、辽宁二队。 |
| 第四组——上海一队、湖南队、河南二队、陕西队。 | 第十一组——四川队、福建一队、山东二队、河南一队。 |
| 第五组——北京二队、吉林队、甘肃队。 | 第十二组——广东一队、浙江一队、湖北二队。 |
| 第六组——山东一队、广西队、河北二队、青海队。 | 第十三组——北京一队、辽宁队、上海四队、江西队。 |
| 第七组——北京一队、辽宁队、上海二队、浙江队。 | 第十四组——四川队、江苏队、安徽队。 |



一九六六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四月五日开幕式在上海举行。



第一二六期

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助威、鼓气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个期间，吴晗同志宣扬所谓“海瑞”精神，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其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把他关于海瑞的文章，按照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他排这个队的目的，是为了避开姚文元同志对他的政治批评，说他的《海瑞罢官》写于一九六〇年，跟“单干风”无关。然而弄巧反拙，本想维护耳朵，却露出了屁股。吴晗同志在他的《海瑞罢官》和《海瑞罢官》，跟一九五九年八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联系了起来；这一下子泄露了“天机”。

在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者自称海瑞，恶毒地攻击我们的党，攻击社会主义；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发了海瑞机会主义分子的文章。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又在海瑞画上题，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之后，又煞有介事地心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歪曲历史写了《海瑞罢官》。吴晗同志自己说：历史和史实“重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而是为活人服务；怎么为活人服务？答曰：“写这个人，演这个角色，都要着眼于他所处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有启发作用”。是的，在庐山会议之前，吴晗同志就着眼于海瑞的，骂皇帝；其意图就是给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摇旗助威，好比旧戏出“大将”以向陈队策的“急风浪”。在庐山会议之后，他着眼于海瑞的，是“骂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不灰溜溜的，很很显的，这是为了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打气、打气，要他们“失败了再干”，而且还盼望着“海瑞”有朝一日“再居官重整旧观”。《海瑞罢官》剧本！嘿！

（尧峰：《此地无银三百两》；见《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

用“为民请命”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涂脂抹粉

当一九五九到一九六〇年，我国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在经济上出现了暂时的困难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活跃起来，他们完全抛开客观的因素，幸灾乐祸地诅咒领导群众运动的文章。就在一九五九年的六月十六日，吴晗同志抛出了他的《海瑞罢官》。借古讽今，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相配合。他在这篇文章中含沙射影地说什么“人民骂皇帝而不可得”，“真有了官，却怕难请”；又说什么“海瑞大骂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他的名声越来越高”了。吴晗同志说这些话是为了什么呢？难道能说不是借古骂今吗，难道能说不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那种反党活动拍手称快，为他们撑腰打气吗？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领导群众运动的党，却打着“为民请命”、捍卫农民利益的幌子，以农民利益的“保护者”自居，把自己打扮成农民的“救星”。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刻下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披着这样的“为民请命”的画皮，使他们的反党面目暴露无遗。这时吴晗同志又情急，就赶紧在《论海瑞》《海瑞罢官》中大作文章，虚构了一个海瑞的社会主义形象，美化所谓“为民请命”的英雄”。他说海瑞是“站在农民一边的”，“他一生处处为事情为百姓设想，为民请命”；他的“作为是为农民，特别为贫农、中农有利的”；他为农民的利益，“勇猛地把全部生命投入战斗”。吴晗同志对海瑞的这种神化刻划，完全是想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穿上海瑞的服装，借海瑞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涂脂抹粉，并鼓动人们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活动喝采。（肖律生，王健生：《“海瑞”是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工具》；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给右倾机会主义者提供的标本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竭力炫耀《论海瑞》这篇文章，说它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借、歪曲海瑞的”。在什么吴晗同志要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抛出《论海瑞》这篇文章来炫耀？那是因为，他说他的《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既然吴晗写《论海瑞》的动机不坏，写《海瑞罢官》的动机当然也是不坏的。

那末，且看《论海瑞》中着重渲染和宣扬的又是些什么东西：

海瑞是“不怕官，敢顶上官的官员，敢替老百姓撑腰说话的小官”，他“刚毅勇决”，“站在农民一边”，“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

海瑞“是大丈夫，是古往今来一个男子”，他痛心“现在医国的是一味甘草，处世的只两只羊毫”；

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招魂

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塑造的“英雄”形象

当右倾机会主义者遭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斗争，一败涂地的时候，吴晗同志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撑，要他们去官，也“心胸开阔”，说什么“纵然去官不留名，清名千古永流芳”。《海瑞罢官》的前几幅词还有这样一句话：“这年头，就是好官，也要去官”。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发泄了。他对党和人民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极为不满，认为他们是“好官”，为他们的“罢官”喊冤叫屈，打“抱不平”。《海瑞罢官》不但为被人民所唾弃而又“罢”了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愤歌，而且鼓动他们“失败了再干”，等待有朝一日，“再居官重整旧观”，也就是要他们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到底。“海瑞”实际上是在一个顽固固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英雄”形象。

所谓“退田”、“除霸”、“罢官”，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其核心在于“罢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叫喊的人民公社“办早了，办错了”，就是要“退田”。他们攻击一事，不计其数，为了他们的伟大事业和他们的干部队伍组成“黑潮一团”，因此叫作“除霸”，“除害先除当道贼”，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英雄”的“退田”和“除霸”的进攻失败了，被撤职了，但还要卷土重来，这就是“罢官”的真谛。事实很清楚，吴晗同志正是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手里的武器，再把他目光擦亮，用来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这就是从《论海瑞》到《海瑞罢官》贯穿的一条黑线。吴晗同志现在打起“反

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编者按：自《海瑞罢官》的讨论开展以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政治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些文章指出：吴晗同志写的《海瑞罢官》及其他有关海瑞的文章，都是全心全力支持右倾机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是同情、赞扬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激励他们“失败了再干”；这出鼓吹“退田”、“平冤狱”，煽动“单干风”、“翻案风”。《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除本报已经发表的以外，现将一些文章有关这方面的论点摘编于后。

吴晗同志全力支持右倾机会主义

海瑞说：“这等世界，使得成甚事业”；“民穷之故多端，大抵官不得其人为第一之害”；“海瑞”“意主于利民”，“为百姓痛哭”，“为百姓长太息”；海瑞“痛斥当时的社会风气”，“反对坏人坏事，不屈不挠，从不灰心丧气，勇敢地把生命投入战斗”；他“曾经遭受攻击、排挤、骂骂，坐过牢，丢过官”，但他“是当代伟人”。

我们要问吴晗同志：今天全国人民早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了国家的主人，你号召学习海瑞“替老百姓撑腰说话”，究竟要向谁去说话呢？你号召学习海瑞“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究竟那些人是“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的人”呢？你号召学习海瑞“把生命投入战斗”，不但不坐牢丢官，而是要叫谁不怕坐牢丢官而向谁战斗？很明显，吴晗同志竟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借海瑞的躯壳，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提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激励他们起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很显然，《论海瑞》和《海瑞罢官》的创作意图及其“为了活人服务”的目的是一样的。同样是浸透了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现实的不满情绪，表露了他们的阴暗心理；同样是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为他们唱赞歌。

（吴文治：《不能用这样的自我批评回避政治问题》，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

鼓励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精神”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我党向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会后不久，吴晗同志发表了《论海瑞》，大谈海瑞的“为民请命”的思想，大力赞扬“敢顶上官的小官，敢替老百姓撑腰说话的小官”，大谈“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并且说：“这些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吴晗同志所提倡的海瑞精神，在当时的确起了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赞扬和激励的作用。

紧接着，在一九五九年底他又“破门而出”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为什么要“破门而出”呢？这是因为吴晗同志看到了“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所以要占有舞台阵地使古人“好品德”“深入人心”（见吴晗《两次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产生，绝不是吴晗同志自己所说的“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而是有其政治目的。这期间，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大认识，被批判得休无完肤，被罢了“官”的时候。在吴晗同志看来，右倾机会主义者是由于“为民请命”而罢了“官”的，所以同情他们，为他们鸣不平，而且还鼓励他们“不为一己私利所惑，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希望右倾机会主义者有朝一日“再居官重整旧观”。

（卢文辉、王悦：《吴晗同志为谁请命》，见《辽宁日报》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

反动的政治动机是隐瞒不住的

吴晗同志把他有关文章的写作时间介绍了一下，认为《论海瑞》写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之后，是响应党的号召，“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借、歪曲海瑞的”，又说出他的文章“都是一九六〇年以前写成的”，表明他的《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无关。

就吴晗同志介绍的写作时间来说，也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事实是，除了《海瑞罢官》发表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之前外，还有《海瑞的故事》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新观察》；《清官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北京日报》。这三篇歌颂海瑞的文章都写于八届八中全会之前，显然不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而《论海瑞》是在上述三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其政治观点、历史观点上述三篇文章完全一致。那么请问：这篇文章的动作动机，为什么突然变成反右倾机会主义？

由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国内阶级敌人以为有机可乘，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极力鼓吹“单干风”、“翻案风”，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散布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毒草。正是在这样的几年中，吴晗同志写文章、编剧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鼓吹海瑞，而且又是狂热地鼓吹海瑞的“退田”“平冤狱”，狂热地鼓吹海瑞的“不畏强暴屈服，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这不是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恢复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项目吗？不是为了失败的反对社会主义分子鼓气吗？事实就是事实，创作《海瑞罢官》的政治动机是隐瞒不了的。

（黄祖良 林扶民 蔡景康：《反动的政治动机是隐瞒不住的》，见《福建日报》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为“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鸣不平

吴晗同志为了为掩饰他的动机，竭力把动机和效果分开。他在他的文章一开头，就列了一个从《海瑞罢官》到《海瑞罢官》的写作时间表，对这种用意，我们是能够看的，那是在用写作时间和主题等，竭力用词《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不文章写的写作时间还差，一篇文章写的写作时间，真相差大白于天下，恰好暴露了吴晗同志写作的政治动机。在一九五九年六月，正当庐山会议前三日，这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在肆无忌惮地向党进攻，污蔑三大作风，辱骂群众运动。而正当这时，吴晗同志写了《海瑞罢官》，极力赞扬一种

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气和胆量。试问，选择这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岂不是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紧紧相呼吗？一九五九年九月，庐山会议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反击，他们的反党面目暴露无遗，完全陷于孤立。这时候，吴晗同志就迫不及待地赶写了《论海瑞》，竭力宣传“为民请命”的“傲骨精神”，据他说这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但在我看来，事情决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其用意明明是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要他们同党同人民对抗到底。一九五九年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吴晗同志于此时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动笔写了《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主题，据吴晗同志说不退田，而是除霸。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剧本的主题是“罢官”，是对那些自称“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反党反人民的“英雄”，给予了无限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出主意。要他们像海瑞那样，罢官了，决不善于甘休，也不能走得失溜漏的。这样一个写作时间表，这些文章和剧本的这种主题思想，说明什么呢？它告诉人们，吴晗同志是在用海瑞的幽灵，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表同情，抱冤愤，鸣不平，出谋划策，撑腰打气。

（史绍宾：《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几个问题》，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

破门而出，支持“不怕丢官”的“英雄”

吴晗同志一九五九年发表《海瑞骂皇帝》，有的人还为他大加吹捧，大书特书。我们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

大家还记得，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我国经济遭到

为“单干”、“翻案”煽风点火

大肆叫嚣“退田”、“平冤狱”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不仅不承认《海瑞罢官》的政治错误，反而说这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但是，事实不容抵赖。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间，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异常尖锐复杂。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了反华大合唱。国内，首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出来反党，攻击，攻击正面红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办错了”了。接着，社会上又吹起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主张把公社的土地分给个人，实行“包产到户”，要求给地富反坏平反“冤狱”，作为一个革命的文笔工作者，应当拿起文艺的武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大举阶级斗争。吴晗同志不仅没有这样做，相反倒“破门而出”，写了《海瑞罢官》，火上加油。我们的人民振臂高呼：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洪阿兰：“青天大老爷”为民请冤，公侯万万代”）通过海瑞的口号大造：“江南告灾潦，不遇田佃不久长”，“冤狱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农民”，作者并把海瑞编成了一个专门给“退田”“平冤狱”的“为民请命”的“不怕死”的英雄”，百般颂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广大劳苦大众早在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压在头上的敌人，报了仇、伸了冤，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海瑞罢官》中的这样一些描写，究竟是在借谁说话？为谁服务？为谁有利，不是很清楚吗？

（李郁廷：《“历史”的迷雾，时代”的反调》，见《文艺报》一九六六年第一期）

煽动牛鬼蛇神兴风作浪

从解放初期到一九五八年的九年间，吴晗同志在历次思想斗争中，常常初期，甚至批判到思想这样同他有特殊关系的斗争，都没有发火。但是，从一九五九年起，吴晗同志却突然开始活跃起来，大发“野性”，他从《海瑞骂皇帝》、《论海瑞》

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在我们国家里，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吴晗同志正是在这个时候“破门而出”，不但通过新历史剧《海瑞罢官》，而且通过杂文、学术论文、历史故事等等，突出地歌颂海瑞的所谓“好品德”和“斗争精神”；正是在这个时候突出地宣扬封建道德，要把封建道德“古为今用”，“移用在今天”、“应用于今天”；正是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维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反对“是非今古”（《灯下集》六五五）；正是在这个时候“骨瘦在喉”（《学云集》二七三），不，“把它的写出来”不可，等等。所有这些是偶然的吗？不，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吴晗同志的“破门而出”，“坚持到底”，关键就在这里。

所有这些，是目的性“不清楚”的“糊涂”在作怪吗？是“为古而古”在作怪吗？当然不是。吴晗同志“破门而出”创作这个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同上）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吴传启：《吴晗同志“破门而出”为了什么？》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

妄想拆社会主义的台，走资本主义道路

吴晗同志竭力使人相信：《海瑞罢官》即使有错误的話，也只是个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这是十足的自欺欺人的话！那是在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人，他们也在学术领域内搞文章，而干的却是以学术作掩护，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当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这是从史学领域内反对毛泽东思想，进而至于更加明目张胆地，扩大阵地，煽风点火，妄拆社会主义的台。试问吴晗

暂时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国内阶级敌人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就在这种情况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攻击党的总路线和具体方针政策。在一九五九年六月，正是庐山会议前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中央发动猖狂进攻，反对总路线，辱骂群众运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推出了他的《海瑞骂皇帝》，歌颂海瑞骂皇帝的“大无畏”精神，说海瑞“骂”真痛“家穷苦得干干净，没有钱用”，是“骂得非常痛快”，这难道会是偶然巧合，不是有所为而发的吗？一九五九年底，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彻底失败，有些人被罢了官免了职的时候，吴晗同志又不惜“破门而出”，赶写他的新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编造成一个“为民请命”、“不怕丢官”的英雄。这一切不正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吗？除此以外，还能做什么别的解释呢？

（王希哲、杨希铸：《为什么要歌颂〈海瑞骂皇帝〉？》见《北京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

鼓吹右倾机会主义者卷土重来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遭到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遇着困难的困难。这时候，国际上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发出反华大合唱。在国内，一小撮牛鬼蛇神正在蠢蠢而动，掀起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着“为人民利益”的幌子，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攻击三面红旗。他们的进攻，遭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击。

迟不迟早，吴晗同志在这时写出了《海瑞罢官》。并在《海瑞罢官》的序里说：“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屈服，不为失势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海瑞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的的确，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把一个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为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忠仆、美化、歌颂为一个“站在农民一边”为“农民利益而斗争”，因而被“罢”了官的英雄形象。这是为什么呢？他在《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一文里，介绍写《海瑞罢官》的体会时说：“写这个人，演这个角色……不是为了死人是为人服务”。为什么的活人服务？说穿了就是替当时旧帮代农民利益，叫嚣要“单干”、“平反冤狱”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要他们去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有一日再居官重整旧观”卷土重来。吴晗同志通过对海瑞的美化、歌颂，寄托了自己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情，发泄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深刻不满。从《海瑞罢官》演出和出版后的社会效果看来，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吴晗同志在他的《海瑞罢官》中，假借海瑞之名，攻击今天的社会主义。因此，我说：它是“一株大毒草”。

（杨光祖：《海瑞罢官——究竟在宣扬什么？》见《云南日报》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为“单干”、“翻案”煽风点火

一直到“破门而出”写出了《海瑞罢官》，三年间就写了几十篇文章将近一百五十篇。是什么使吴晗同志这么“难变”，“非写不可”？他又写了些什么呢？他着重描写的就是：“乡官强暴百姓，如狼似虎田野空”，“冤狱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农民”。接着，他从封建文化的武库里捡起了一件破烂东西，煞将起来。这就是“为民作主”，鼓励人们“告状”。《海瑞罢官》，就是吴晗同志宣扬“告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的宣言书。吴晗同志的文章，是助长当时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掀起“翻案风”的一把火，事实正是这样。在《海瑞罢官》剧本发表后，上海有个特务的家属，就递了一份要求“平冤狱”的“状纸”，上面公然写道：“在现世世非福瑞生，方能起雷，否则此理迷。”这就不就是吴晗同志的“告状”说的现在政治意义么？如果吴晗同志不是同我们党的这些分析，希望他能够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一些，究竟该怎样理解或解释“新”理论。

（罗思鼎：《论“告状”》，见《文汇报》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

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写道“退田”，宣传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有土地地何愁衣饿，无粮就在眼前”，把它的作为一种农民的觉悟、理想生活来宣扬，这是什么意思呢？且不说农民从来没有哪个时期能够自动地“退田”给农民的事情，而农民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吗？我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了，经过土地革命，把荒地荒地变成了自己的土地。但是，如果广大农民仅仅停留在分得土地，而不进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化、人民公社的道路，我国广大农民仍然不能从封建剥削和落后的状况下，而且保持小农私有经济还有利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势力的卷土重来。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鼓吹什么农民有了土地就能美好生活，那就决不是在为农民说话，恰恰是违背了农民的根本利益，而为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妄想服务。而在一九六一年前后出现单干风的情况下下来鼓吹这种主张，那就要是一股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徐公持、周南：《海瑞罢官》散布了反社会主义的毒素》，见《工人日报》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

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同志：在阶级斗争大复辟的那几年内，你这样狂热，搞出一套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难道是学术问题？能说不是政治问题？

吴晗同志说，他“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这完全是假话。从吴晗同志这些年的一贯活动看，他不但没有脱离政治，没有脱离现实，而且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政治嗅觉的、很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一回事的人。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搞的是资产阶级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

（史绍宾：《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几个问题》，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一九六一年左右，国际上出现了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他们千方百计地美化美国帝国主义，说什么美国形而上学，也有“明智”、勇敢，宣扬“三和”投降路线；在国内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乘机蠢动，他们使我们国家由于自然灾害在经济上受到了暂时的困难，企图假借倒算。吴晗同志正是选择这个时候，有计划的向大地向人们写海瑞，大讲而特讲海瑞，说什么海瑞是“有目的”，应当肯定，应当歌颂，什么海瑞是“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啊，什么海瑞是人民心目中的“好官”啊，是值得研究与学习啊，这究竟说明什么的需要，不是很明显吗？

我们绝对不能上吴晗同志阶级调和论的当，一定要和他划清界限，把他“借古讽今”反社会主义的面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海瑞罢官》决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它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识形态上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吴晗同志是希望我们工人阶级能跟着海瑞跑，替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失去了自由的地富反党分子摇旗呐喊。

既然吴晗同志搞着学术研究的外衣，为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服务，向我们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发动进攻，那末，在这场大辩论中，我们工人阶级同志应该予以坚决的、有力的回击。

（陈阿发：《只是学术上的错误吗？》见《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

